

浙江省制造业企业时空迁移特征及驱动机理

——基于县域尺度

张杰^{1, 2} 唐根年^{1, 31}

(1. 浙江工业大学 经济学院, 中国浙江 杭州 310023;

2. 湖南工商大学 旅游管理学院, 中国湖南 长沙 410205;

3. 浙江工业大学 之江学院, 中国浙江 绍兴 312030)

【摘要】: 基于中国工业企业统计数据库, 依据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核心—外围分析方法和条件 logit 模型, 将浙江省 90 个区县分为核心区、次核心区、次边缘区和边缘区, 研究 1998—2013 年制造业企业在省内迁移的时空特征及其驱动机理, 结果表明: ①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迁移企业数量的增加, 迁移活动涉及区县数量增多, 促进全省企业迁移网络密度增加。但是三大核心城市仍为企业迁移活动的高发区域, 其他外围城市仍为低发区域, 依托核心城市形成的三大迁移板块格局并未发生实质性改变, 迁移活动仍具有较强的区域性。②来自四类区域的企业区位再选择偏好存在时空上的差异性。目前, 次边缘区已取代核心区, 成为核心区与次核心区企业再区位的首选区域。③企业迁移受多重因素的驱动和制约, 浙江省制造业企业迁移与一般企业空间布局的影响因素存在一定的差异, 体现出企业迁移区位再选择的特殊性。

【关键词】: 企业迁移 制造业 产业结构转型 驱动机理 核心—边缘结构 土地成本 产业园区政策

【中图分类号】: F062.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0-8462 (2019) 06-0118-09

1990 年代以来,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 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参与到全球生产网络体系中。面临国内外激烈的市场竞争, 企业为寻求最佳的生产区位, 加快了企业迁移活动。目前, 企业迁移已成为学界研究热点之一。企业迁移既包括企业整体性从原址迁出, 也包括部分活动由原址迁出并在新址经营^[1], 它是企业为适应新形势而进行的区位再调整的过程。企业迁移不仅对企业的自身发展十分重要, 而且迁移活动促进了要素的区间流动, 起到了资源在空间重新配置的作用, 对迁出地和迁入地的区域经济发展都有重大影响^[2]。

国外研究企业迁移较早, 形成了较为丰富的企业迁移理论^[3]。Mc Laughlin 等最早关注了美国企业迁移^[4]。Pellenbarg 总结了前人相关理论, 认为在 1950 年前的工业革命时期, 运输和劳动力成本是影响企业区位的主要因素; 1950 年后, 企业的迁移主要受到集聚经济的影响; 1990 年后, 受行为主义的影响, 研究视角由过去的空间集聚向空间扩散转变, 影响企业迁移的区位因素包括知

作者简介: 张杰(1973-), 男, 江苏徐州人, 博士研究生, 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产业经济。E-mail: zhangjie@hnuc.edu.cn。唐根年(1964-), 男, 浙江湖州人, 博士, 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产业经济和经济地理。E-mail: tanggennian@zjut.edu.cn。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1473224、71073146); 浙江省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2017C25016)。

识和信息设施、政府影响、劳动力技能、生态因素、典型场所、民众心态、生活条件等^[5]。当前,学界主要从两个区域方向关注企业迁移:一是研究企业的跨国迁移^[6-8],二是研究在国内的迁移^[9-10]。尽管国内学者研究企业迁移起步相对较晚,但已取得了十分丰富的研究成果。国内研究企业跨国迁移以研究外资企业在华区位选择居多^[11-12],之后,随着中国制造业实施“走出去”战略,研究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区位选择逐渐增多^[13-14]。关于国内的企业迁移,国内学者从全国范围内的总部迁移^[15-16]、跨区域迁移^[17-19]、本区域内企业迁移和企业郊区化^[20-21]等不同空间视角,研究了企业迁移行为、迁移特征、迁移绩效和影响因素等。由于受到微观企业的相关数据获取的限制,学者通常采用调查问卷、访谈的方式,分析企业的迁移动机与意愿,区位选择和迁移特征以及影响因素等^[11,17,22]。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相关企业数据库的建立与公开,一些学者利用相关企业数据库^[21,23]、内容文本方法^[24],并通过理论建模^[12,23]等数理统计的方法,研究企业迁移的影响因素,丰富了企业迁移的研究。由于企业迁移的相关文献在区域空间尺度、研究数据来源、研究方法以及研究时间上存在差异,导致了不同的研究结论。陈建军调研了世纪之交的浙江省外迁企业,发现寻求扩大市场、产业结构调整,以及边际效益最大化和企业成长是企业迁移的主要动力^[17]。杨菊萍等认为影响中国企业迁移重要性依次为迁入地政策、迁入地经济发展水平、企业战略和企业情感^[24]。余珮等认为市场需求、劳动市场、交通运输以及集聚效应对外资在华区位选择有重要的影响^[23]。魏后凯、吴波等对中国上市公司总部的迁移研究发现,总部迁移是因为迁入地在知识和技术禀赋方面更具优势,同时迁入地良好的商务服务优势和信息沟通优势能为企业在投融资上带来便利^[15-16]。上市公司总部的迁移符合西方区位理论的普遍预期。然而,蔡春萍、张学华等在对东部沿海地区的一些中小型企业迁移的调查研究中,发现中小企业在原址区域的社会网络深度嵌入阻力,大大降低了企业迁移意愿,不利于企业迁移^[22,25]。此外,由于中国东部沿海地区一直是企业迁移的高发区域,也成为国内学界关注的重点区域。

通过对上述相关文献的梳理,本文以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为样本,研究浙江省制造业企业在本省内跨县区的迁移特征,探讨影响制造业企业迁移的驱动机理,以期为制造业企业迁移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撑和决策借鉴。

1 研究方法

1.1 社会网络分析法

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利用 Ucinet6.186 软件平台分析浙江省各区县企业迁移的点出(入)度和网络密度。点出(入)度指各区县企业迁出(入)数。网络密度反映了网络中各区域之间网络关联的程度,网络中节点间关联关系的数量越多,则网络密度越大。点出(入)度和网络密度计算过程见文献^[26]。

1.2 核心—边缘分析方法

利用新经济地理学“核心—边缘”分析框架,依据 1998—2008 年各区县单位面积制造业生产总值的均值,将 90 个区县划分为核心区、次核心区、次边缘区和边缘区 4 个区域类型,单位面积制造业生产总值指标反映单位面积的制造业的产出效率情况。通过把浙江省 90 个区县分层,以期发现企业区位再选择偏好的时空特征。

2 研究区域、数据来源与处理

2.1 研究区域

本文企业迁移数据来源于中国工业企业统计数据库,通过按照下文对数据库的处理,发现浙江省制造业企业迁往省外的企业数极少,因此,本文所研究范围仅为浙江省制造业企业在省内的迁移,也不包括浙江省外企业向浙江省的迁移。由于研究时间截至 2013 年,故研究区域为包括宁波市江东区在内的 90 个区县。

2.2 数据来源及处理

本文数据来源于 1998—2013 年中国工业企业统计数据库、《浙江统计年鉴》、各地市统计年鉴,以及原国土资源部 2007 年实施的《全国工业用地出让最低价标准》。为研究需要,本文将企业迁移划分为 1998—2003 年、2003—2008 年、2008—2013 年三个阶段,借鉴 Bellone 等^[27]的方法将企业状态分为进入、存活和退出三种,分别对比 1998 和 2003 年、2003 和 2008 年、2008 和 2013 年数据信息,区分出三个阶段的存活和退出企业。为了提高识别的可靠性和准确性,本文还参照了毛其淋等^[28]的处理方法,并且进一步依据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对数据进行校正。通过上述方法,在扣除行政区划调整因素后,最后得到三个阶段的省内企业迁移数分别为 74、311 和 305 家。

3 浙江省制造业企业迁移时空特征

3.1 企业迁移的网络特征

根据企业迁移网络密度计算公式,得到三个阶段的网络密度分别为 0.0251、0.0222 和 0.0781(表 1),企业迁移网络密度总体上呈增强态势,这说明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交通等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等,越来越多的区县和企业参与到迁移活动中。对比企业迁移网络图(图 1),企业迁移活动体现了较强的族群性。在前两个阶段中,大量的区县为边缘节点,并且形成了较多迁移网络群组,各群组彼此间缺乏连接,相对孤立。在第三阶段中,尽管仍存在孤立的群组,但该阶段形成了一个涉及区县数量很多的迁移群组,表明更多的区县彼此间建立起不同程度的企业迁移流。

表 1 不同阶段企业迁移网络特征

	1998—2003 年	2003—2008 年	2008—2013 年
网络密度	0.0251	0.0222	0.0781
节点数/个	28	46	63
节点数占全省比例/%	31.1	51.1	70

3.2 企业迁移的区域性特征

企业迁移在网络上表现出显著的族群性,在地理空间上则体现了较强的区域性。从三个阶段的迁移图(图 2)可以看出,浙江省企业迁移活动大体可分为三大板块:以杭州市为中心的杭嘉湖板块,以宁波市为中心的宁波舟山板块,以温州市为中心的温台板块。从点出(入)度排名前十名区县来看(表 2),三个阶段的前十名的点出(入)度区县迁出(入)企业总数均占本阶段总迁移数的 2/3 以上。可以说,点出(入)度排名前十名的区县是浙江省企业迁移活动热点区县。值得指出是,余杭区在第二、三阶段点入度较第一阶段呈现出几何级数的增长,远超第二名,表明余杭区已经成为浙江省最热的迁入地。同时,表 2 还进一步表明,在前两个阶段中,各有一个外围城市所属区县(柯城区、婺城区、衢江区和金东区)进入点出(入)度区县前十名,而在第三阶段,则无一外围城市所属区县。因此,三大核心城市已为浙江省制造业企业迁移活动的高发区域,而外围城市则为企业迁移的低发区域。核心城市与外围城市共同形成了企业迁移的“核心—外围”结构,使企业转移活动呈现出较强的区域性特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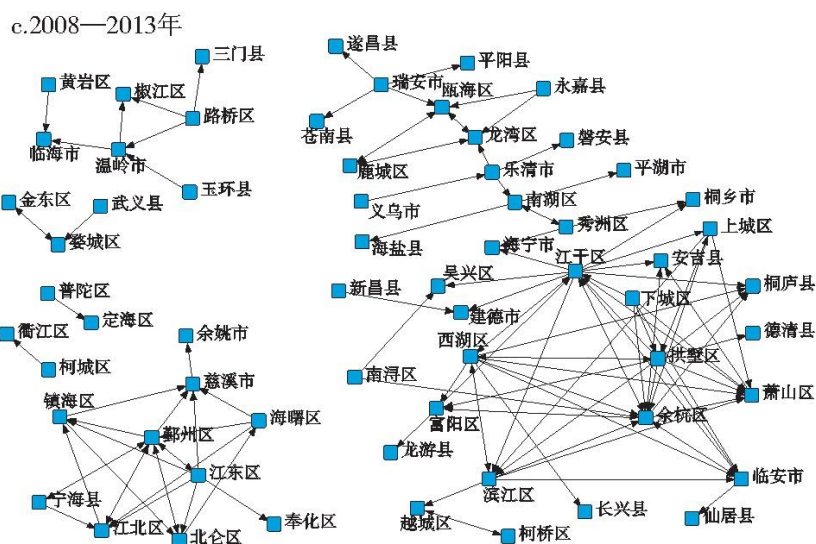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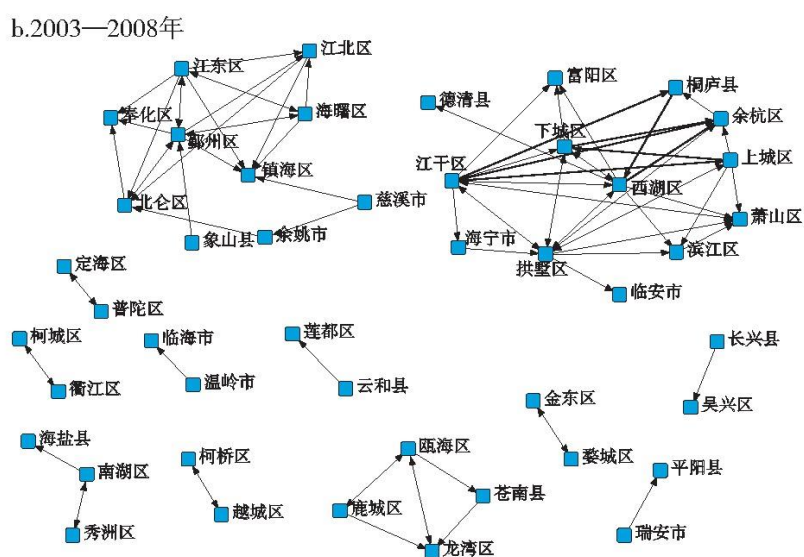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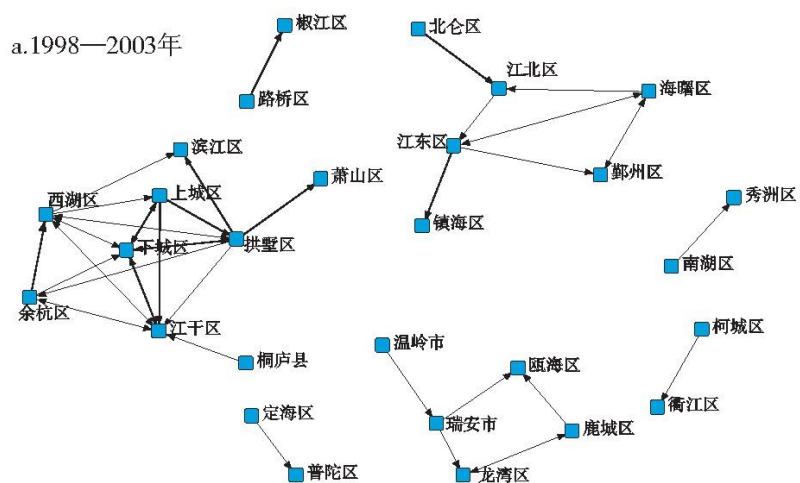


图 1 不同阶段制造业企业迁移网络

(1)三大核心城市企业迁移的时空特征。在第一阶段,三大核心城市企业迁移数量较少,企业迁移的活动半径较小,企业迁移多在市区内部。在第二阶段,三大核心城市企业迁移数量显著增多,本市参与企业迁移活动的近郊和远郊区县数增加(杭州市新增富阳市和临安市,宁波市新增余姚市、慈溪市、奉化市和象山县,温州市新增加了平阳县和苍南县),企业迁移半径有所扩大,并与外围城市发生零星的迁移联系。在第三阶段,三大核心城市内部参与企业迁移活动的近郊和远郊区县数继续增加。除宁波市未与本市域外地区产生企业迁移联系外,杭州市和温州市企业迁移活动区域突破了前一阶段的活动半径范围,扩大了与本市以外的区县的联系。当然,这种城市间的企业迁移数量比例仍然不大,更多地是本地区内的企业迁出或迁入。

(2)外围城市企业迁移的时空特征。在第一阶段中,外围城市的企业迁移主要集中在本市市区内部。在第二阶段中,外围城市参与企业迁移活动的区县数逐步增加,如嘉兴市的海宁市和海盐县、金华市的婺城区和金东区、绍兴市的越城区和柯桥区等。在第三阶段中,外围城市参与企业迁移活动的郊区区县数量持续增加,新增平湖市、桐乡市、新昌县、义乌市、武义县、磐安县、龙游县、黄岩区、玉环县、三门县、仙居县和遂昌县等区县。同时,外围城市之间、外围与核心城市之间的企业迁移联系有了不同程度的增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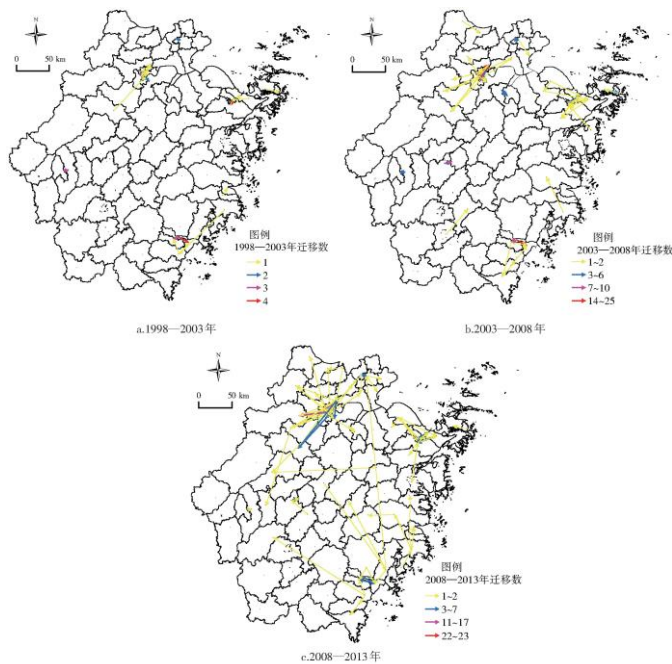


图 2 不同阶段制造业企业迁移图

表 2 制造业企业迁移网络节点中心度前十名

点出度						点入度					
1998—2003 年		2003—2008 年		2008—2013 年		1998—2003 年		2003—2008 年		2008—2013 年	
地区	数量	地区	数量	地区	数量	地区	数量	地区	数量	地区	数量
拱墅区	12	西湖区	40	江干区	42	江干区	10	余杭区	56	余杭区	60
西湖区	8	鹿城区	39	西湖区	30	拱墅区	7	鄞州区	30	瓯海区	31
鹿城区	7	拱墅区	34	鹿城区	28	西湖区	7	江干区	29	临安市	25
上城区	6	下城区	31	下城区	27	下城区	7	瓯海区	26	萧山区	19
海曙区	6	江东区	29	拱墅区	25	鄞州区	6	龙湾区	17	鄞州区	17
江东区	6	江干区	23	江东区	22	江东区	5	西湖区	13	滨江区	12

下城区	5	上城区	16	滨江区	13	龙湾区	5	滨江区	13	龙湾区	12
江干区	4	海曙区	14	鄞州区	12	瓯海区	4	萧山区	12	江北区	9
余杭区	3	瓯海区	11	余杭区	11	衢江区	3	镇海区	10	镇海区	9
柯城区	3	婺城区	9	上城区	9	鹿城区	2	金东区	9	桐庐县	9
前十合计	60		246		219		56		215		203
全省合计	74		311		305		74		311		305
前十占比	0.811		0.791		0.718		0.757		0.691		0.666

3.3 迁移企业区位再选择偏好特征

尽管三个阶段的绝大多数迁出企业集中在核心区和次核心区,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来自次边缘区和边缘区的迁出企业数量呈增加态势(表3)。这表明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完善和确立,越来越多的来自欠发达区域的企业,更愿意通过区位再调整以参与激烈的市场竞争。同时,来自四类区域的企业区位再选择偏好存在时空上差异性。

第一阶段:来自核心区的企业选择迁入地时更加偏好核心区,其次为次核心区。来自次核心区的迁出企业把核心区作为迁移的首选目的地。来自核心区和次核心区企业的再区位选择偏好,表明了核心区和次核心区在经济发展上具有较强的相似性和邻近性。这一时期,核心区和次核心区的迁出企业很少有意愿迁往边缘区,说明在改革开放的早期阶段,浙江省经济社会发展的非均衡性,导致企业迁移区位存在较大的差异性。

第二阶段:来自核心区的迁移企业首选目的地为次核心区,同时向次边缘区迁移的数量有所增加。来自次核心区企业出现了两种明显的选择偏好,即迁往核心区和次边缘区的数量大体相当。次边缘区企业区位选择偏好主要倾向于邻近的边缘区和次核心区。来自次核心区和次边缘区的迁出企业,所呈现出的两种区位选择偏好,表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制造业企业的迁移选择出现了分化现象:一部分企业倾向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更高的区域发展;而另一部分企业则倾向于经济社会发展较低水平的区域发展。在该阶段,边缘区企业也受到市场机制的影响,参与迁移活动的企业数较前期有了明显的增加,但多偏好次边缘区。

表3 不同阶段的迁移企业区位再选择偏好矩阵

迁入地/迁出地	核心区	次核心区	次边缘区	边缘区
核心区	22/41/20	17/67/46	2/48/60	0/2/28
次核心区	15/50/29	2/5/14	6/48/43	0/1/8
次边缘区	3/4/7	1/12/14	2/5/9	3/15/13
边缘区	1/1/2	0/2/2	0/9/8	0/1/2

第三阶段:来自核心区的企业,区位再选择偏好上发生了三个较为显著的变化,第一,首选目的地由次核心区演化为次边缘区。第二,在本区域内部进行区位调整的数量比例明显下降;第三,迁往边缘区的企业数量显著增加。来自次核心区的企业,区位首选偏好为次边缘区,迁往核心区企业明显比第二阶段减少,在本区域内部和向边缘区迁移有明显增加。上述变化表明,来自核心区的企业,再区位首选偏好经历了“核心区—次核心区—次边缘区”的演化过程;来自次核心区的企业,则经历了“核心区—核心区—次边缘区—次边缘区”的演化过程。此时,次边缘区成为核心区与次核心区企业再区位的首选区域,表明随着边缘区域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扩大了核心区和次核心区迁移的选择空间。这一阶段中,次边缘区和边缘区的企业区位再选择偏好与第二阶段大体类似,未发生较大的变化。

4 企业迁移的驱动机理分析

由于受浙江省各区县数据获取的限制,本文只研究影响第三阶段的企业迁移的因素,迁移企业数据为前文统计的 305 家企业。尽管企业迁移时间前后不一,但是区县社会经济整体格局相对变动不大,因此,本文将该阶段的企业迁移活动统一视为在 2009 年后迁移,各变量数据均为 2008 年区县数据。这种时间滞后的处理方式,参照了陈健等^[12]方法,可以从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可能存在一定的滞后性来理解。

4.1 企业迁移驱动机理的模型建构

条件 logit 模型用于分组数据,是在多元 logit 模型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目前,该模型已广泛应用于企业区位选择分析^[29-30]。对于本文企业迁移区位选择问题来说,企业的特性都是确定的,这意味着它们不会变动。只有迁入地的特征对区位选择有影响,能为迁移企业带来新的效用。因此,迁移企业 i 选择地区 j 所带来的随机效用记为:

$$U_{ij} = x'_{ij}\beta + \varepsilon_{ij} (i = 1, 2, \dots, n; j = 1, 2, \dots, J) \quad (1)$$

如果误差项独立分布,并具有相同的极值,那么迁移企业 i 选择地区 j 的概率如下:

$$p(y_i = j | x_{ij}) = \frac{\exp(x'_{ij}\beta)}{\sum_{k=1}^J \exp(x'_{ik}\beta)} \quad (2)$$

4.2 变量选取处理

因变量为 51 个区县(为前文点入度的区县数) k 被 305 家企业选为投资目的地的情况。如果区县 k 被企业 i 选中,因变量记为 1,如果没有,则记为 0。影响制造业企业区位再选择的驱动因素是多重的,结合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选取 15 个解释变量,从经济发展、生产经营成本、基础设施、经济地理和地方政策因素等方面加以考察。

(1) 经济发展因素。经济发展水平(X_1):经济社会发展程度高的地区,社会较为稳定,有利于生产建设的开展进行,指标选取各区县人均 GDP。市场规模(X_2):新经济地理学认为企业由于前后向的经济关联,倾向于市场规模大的地区生产,市场规模影响企业区位调整,指标选取 GDP。工业化水平(X_3):随着工业化的发展,第三产业比重将逐步上升。第三产业比重越高的地区越不利于企业的迁入,指标选取第三产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对外开放度(X_4):经济全球化有助于区域经济增长,影响了制造业的空间格局。对外开放度高的区域对企业迁移有着较强的吸引力,指标选取各区县实际利用 FDI 金额。企业迁移还受到其他迁移企业的影响,先期迁入的企业通过群聚效应带动和促进后续企业的迁入^[1]。企业迁移的群聚效应(X_5)指标选取各区县前期迁入企业数。

(2) 基础设施因素。信息化水平(X_6):便捷畅通的信息通讯基础设施,促进了信息的传播,有利于企业的增长和集聚,指标选取各区县人均电信业务收入。交通可达性(X_7):良好的区域交通基础设施有利于企业向该区域集聚,企业也通常向基础设施良好的地区迁移,指标选取各区县公路里程数/ km^2 。技术创新水平(X_8):新经济地理学还认为技术创新是影响产业空间格局重要因素,企业向技术禀赋高的区域迁移有利于获取技术要素资源,提升企业技术水平,指标选取各区县每万人专利授权量。

(3) 生产经营成本因素。迁移成本(X_9):企业迁移成本影响企业的区位再选择,通常企业倾向于在邻近地区重新选址,企业距离备选区位越远,企业的迁移的交通成本就越高,企业迁移意愿越小。同时,企业的迁移还受到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22, 31],浙江省制造

业企业大多是在乡镇民营企业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长期的生产经营中,企业已与当地其他企业、政府、科研机构、供应商、客户等,形成了较为稳固的非正式社会网络关系。这种浓厚的社会文化根植性孕育出浙江省中小企业浓厚的乡土意识,企业更加偏好于在本地区经营发展。因此,较远距离的迁移,可能增加企业交通费用和潜在的机会成本。该指标选取企业 2008 年原址到 2013 年新址的距离。此外,企业在进行迁移决策时,基于利益最大化和成本最小化的考虑,通常会选择劳动力成本和土地成本较低的区域,劳动力成本(X_{10})指标选取各区县城镇职工平均工资,土地成本(X_{11})指标选取各区县最低土地出让价格。

(4) 地方政策因素。影响企业迁移的因素还包括产业开发园区,政府通过建立各类产业园区,通过优惠的税收和土地政策等,吸引企业入驻。本文引入区县是否有省级开发园区(X_{12})和国家级开发园区(X_{13}),以分析不同级别的开发园区的发展政策对企业迁移的影响,有省级(或国家)开发园区的赋值为 1,其他为 0。在新型城市化背景下,政府为实现城市发展格局的调整和产业结构升级,通过实施“退二进三”政策,引导制造业企业从核心城区退出。为此,引入区县是否为城市核心城区虚拟变量(X_{14}),作为城市“退二进三”政策指标,处在城市核心城区的赋值为 1,其他为 0。

(5) 区位因素。前文分析了三阶段点入度排名前十名的区县,这些区县已成为全省热点迁入地,特别是第三阶段热点区县全部集中在三大核心城市,三大城市与其他城市组成了“核心—外围”结构,对此还需要从统计上进一步验证这种经验性的结论。本文引入区县是否处于三大核心城市(X_{15}),作为衡量全省城市“核心—外围”结构指标,核心城市所述区县赋值为 1,否则为 0。以上解释变量除虚拟变量外,其他自变量均采用自然对数处理。

4.3 计量结果分析

在进行条件 logit 回归分析前,对自变量进行相关性检验,表明人均 GDP 与 GDP、技术创新水平和土地价格,工业化水平与“退二进三”政策具有较高的相关性。为消除多重共线性对模型的影响,分别把变量引入模型估计。同时,考虑到备选方案数量较多时条件 logit 模型的参数估计变得很复杂,本文借鉴贺灿飞等^[30]处理方法,选取 27 个区县进行模型估计。

条件 logit 回归表明,社会发展水平对企业迁移呈显著的负向影响,说明在当前经济社会转型时期,企业正在由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高的区域向水平较低的区域迁移。市场规模对企业迁移影响不显著,可能的原因是许多迁移企业战略定位并非基于本地区域市场,而是全国市场或国际市场,对地方市场规模要求不高。对外开放度对企业迁移的呈显著的正向影响,表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浙江省民营企业实力的壮大,企业积极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意愿增强。工业化水平影响显著为负,表明随着工业化水平的提高,城市产业结构不断转型升级,制造业比重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呈下降的趋势,制约了一些企业向核心城区的迁移。先期企业迁移的群聚效应对后期企业迁入有着十分显著的影响。先期迁入企业通过示范效应和产业的关联效应,吸引后期迁移企业跟随,促进企业在当地的集聚。另一方面,某一企业先期迁入企业的多寡,也为其他企业提供了做出是否迁移决策的重要依据。

信息化水平和交通可达性回归系数均显著为负,说明现阶段企业更倾向于向信息和交通基础设施相对较差的外围区域迁移,进一步验证了前文的分析。技术创新水平对企业迁移有正向的影响,但不显著,这说明企业在向外围迁移的整体态势下,企业仍倾向于选择技术水平较高的区域。当前,企业在政府的引导下纷纷向产业园区集中,省级和国家级产业园区拥有良好信息和交通基础设施和丰富的技术知识人才和资源,为企业发展提供了优越的产业平台,在一定程度上能弥补企业因外迁带来的不利影响。就浙江省来说,省级产业园区对企业迁移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国家级开发园区则有着显著的负向影响。这与当前浙江省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规划有着较大关系,各级各类开发园区通过主导产业的转型升级,推动园区产业的向高端化和智能化方向发展。因此,相比而言,省级开发区比国家级开发区进入门槛较低,更易吸纳处于中低技术水平的企业入驻;其次,随着产业园区主导产业的转型升级,一些不适应国家级产业园区发展的企业更易被淘汰出去。此外,国家级产业园区数量相对较少,相应地企业迁入的选择可能性也会有所下降。

企业迁移成本对企业迁移呈显著的负向影响,表明迁移目的地越远,企业迁移成本越高,企业越没有意愿迁移,企业通常更倾向于近距离迁移。同时,在邻近区域迁移,企业能够尽快地嵌入到新的社会网络关系中,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和规避了因远距离

“退二进三”政策对于浙江省制造业企业迁移影响不显著,这与一些研究城市制造业区位格局的文献存在差异^[32],表明浙江省不同城市社会经济发仍存在较大异质性,如杭州市制造业更多地体现由核心城区向近郊和远郊区扩散,而其他城市核心城区制造业仍存在集聚与扩散并存的现象。另外,区县是否属于三大核心城市对企业迁移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进一步表明良好的区位条件对企业迁移有着重要的作用。上述驱动因素分析说明,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浙江制造业企业迁移受到多重因素的驱动和制约。研究还发现,浙江省制造业企业迁移的影响因素与一般的企业空间布局的影响因素在信息化水平、市场规模、交通可达性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33],体现了制造业企业迁移区位再选择的特殊性。

本文利用 1998—2013 年浙江省制造业微观企业数据,运用社会网络分析与核心—边缘分析方法,从县域视角探讨了企业迁移的时空特征,并通过条件 logit 回归模型分析了制造业企业迁移的驱动机理,得到如下结论:

在世纪之交,浙江省制造业企业迁移数量较少,随着国企改革和市场化进程的深入,企业再区位调整变得日益活跃。但是大多数企业仍多为近距离迁移,跨地区迁移企业数量不多。目前,在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模式背景下,制造业企业迁移更需要选择适宜的区位发展。制造业企业特别是小型企业的经营者和管理者,应突破较为传统的乡土意识,进一步树立符合市场需要的创新理念和现代企业经营理念,实现跨地区的企业扩张和迁移,积极参与国内外市场竞争。其次,各地政府应科学合理地发挥政策导向,在城市外围郊区继续加快产业园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大力引进相关科研机构、增强各类创新平台建设,发挥在科技、人才、信息等方面的优势,引导企业向外围产业园区迁移,实现迁移企业的“二次创业”和产业合理布局,而不是单纯地依靠“退二进三”政策把企业从中心城区“驱赶”出去。同时,各地区还应加强合作,以企业迁移为纽带,促进各类要素跨区域流动和深度融合。沿海地区要加大对浙西和浙南山区新兴产业支持力度,推动外围欠发达区县经济的快速增长,为企业迁入建立起适应当代经济发展的区域投资环境,以实现区域间经济增长的收敛。

9

集资料。另外,企业迁移决策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企业决策者的主观因素也十分重要,这也是今后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

参考文献:

- [1]魏后凯,白玫. 中国企业迁移的特征、决定因素及发展趋势[J]. 发展研究, 2009(10):9-18.
- [2]刘怀德,艾斌. 企业迁移的动因研究[J]. 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5, 20(4):50-53.
- [3]王业强. 国外企业迁移研究综述[J]. 经济地理, 2007, 27(1):30-35.
- [4]McLaughlin G E, Robock S. Why industry moves South: A study of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recent location of manufacturing plants in the South[M]. Kingsport: Kingsport Press, 1949.
- [5]Pellenbarg P H. Sustainable Business Sites in the Netherlands: A Survey of Policies and Experiences[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2002, 45 (1):59-84.
- [6]He Canfei. Location of foreign manufactures in China: Agglomeration economies and country of effects[J]. Regional Science, 2003, 82 (3):351-372.
- [7]Ramos R, Surinach J, Artis M.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and human capital: The role of over-education[J]. Regional Studies, 2012, 46 (10):1 389-1 400.
- [8]Pearce II J A. Why domestic outsourcing is leading America's reemergence in global manufacturing[J]. Business Horizons, 2014, 57 (1):27-36.
- [9]O'hallacha' in B, Leslie T. Postindustrial manufacturing in a sunbelt metropolis: Where are factories located in Phoenix?[J]. Urban Geography, 2009, 30 (8):898-926.
- [10]Liao H F, Chan R C K. Industrial relocation of Hong Kong manufacturing firms: Towards an expanding industrial space beyond the Pearl river Delta[J]. GeoJournal, 2012, 77 (3):361-381.
- [11]魏后凯,贺灿飞,王新. 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动机与区位因素分析[J]. 经济研究, 2001, 36(2):67-76.
- [12]陈健,徐康宁. 跨国公司研发全球化:动因、地域分布及其影响因素分析[J]. 经济学(季刊), 2009, 8(3):871-890.
- [13]赵蓓文. 经济全球化新形势下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J]. 世界经济研究, 2015(6):119-126.
- [14]阎大颖.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及其决定因素[J]. 国际贸易问题, 2013(7):128-135.
- [15]魏后凯,白玫. 中国上市公司总部迁移现状及特征分析[J]. 中国工业经济, 2008(9):13-24.
- [16]吴波,郝云宏,魏立春. 中国上市公司总部迁移的动向与动因研究[J]. 经济地理, 2012, 32(12):8-14.

-
- [17]陈建军. 中国现阶段的产业区域转移及其动力机制[J]. 中国工业经济, 2002(8):37-44.
- [18]祁新华, 朱宇, 张抚秀, 等. 企业区位特征、影响因素及其城镇化效应——基于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实证研究[J]. 地理科学, 2010, 30(2):220-228.
- [19]杨菊萍. 集群企业的迁移:影响因素、方式选择和绩效表现[D]. 杭州:浙江大学, 2010.
- [20]李俊峰, 陶世杰, 高凌宇. 跨江发展下杭州市企业迁移空间模式及影响机制[J]. 地理科学, 2018, 38(1):87-96.
- [21]郭杰, 杨永春, 冷炳荣. 1949 年以来中国西部大城市制造业企业迁移特征、模式及机制——以兰州市为例[J]. 地理研究, 2012, 31(10):1872-1886.
- [22]蔡春萍, 韦素琼, 陈松林, 等. 中小企业迁移:滞后性及其制约因素——基于晋江市安海镇的实证分析[J]. 经济地理, 2014, 34(10):7-14.
- [23]余珮, 陈继勇. 新经济地理学框架下跨国公司在华分层区位选择研究[J]. 世界经济, 2012, 35(11):31-58.
- [24]杨菊萍, 贾生华. 企业迁移的动因识别——基于内容分析法的研究[J]. 地理科学, 2011, 31(1):15-21.
- [25]张学华, 贾金荣. 拓展资源基础观视角下乡村企业迁移意愿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浙江的实证分析[J]. 商业经济与管理, 2012(12):71-77.
- [26]刘军. 整体网分析讲义:UCINET 软件实用指南[M]. 上海:格致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
- [27]Bellone F, Musso P, Nesta L, Quere M, et al. Market selection along the firm life cycle[J]. Industrial and Corporate Change, 2008, 17(4):753-777.
- [28]毛其淋, 盛斌. 中国制造业企业的进入退出与生产率动态演化[J]. 经济研究, 2013, 48(4):16-29.
- [29]黄娉婷, 张晓平. 京津冀都市圈汽车产业空间布局演化研究[J]. 地理研究, 2014, 33(1):83-95.
- [30]贺灿飞, 肖晓俊, 邹沛思. 中国城市正在向功能专业化转型吗?——基于跨国公司区位战略的透视[J]. 城市发展研究, 2012, 19(3):20-29.
- [31]李彦军, 吴迪. 情感因素对企业迁移行为的影响研究[J]. 管理世界, 2016(6):184-185.
- [32]吕卫国, 陈雯. 制造业企业区位选择与南京城市空间重构[J]. 地理学报, 2009, 64(2):142-152.
- [33]张杰, 唐根年. 浙江省制造业空间分异格局及其影响因素[J]. 地理科学, 2018, 38(7):1107-1117.